

第三部

全体讨论

汉语版

1. 总评

石汝傑(熊本学园大学)：

我想有两个方面，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意义很大。首先，从方言地理学的发展来看，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差距有很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想，现在在曹志耘先生他们的研究项目正在改善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语和日语在语言特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我们的这样的研究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想汉语方言学研究，在汉语地理学方面有很多值得向日本学习的方面、内容。一个是日语的方言研究有很多成果，刚才两位先生有介绍。第二个是，在日本有岩田礼和太田斋这样的学者用方言地理学对汉语方言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作为我们今后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呢，刚才曹志耘先生介绍这样大的研究项目对中国方言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而且今后会发生更重大的更深远的影响。所以怎么估计都不会太高吧。所以我觉得这在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方面就是我提出来的希望。因为从日本语言地理研究来看，特别重视方言材料在语言历史的解释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在汉语研究方面，这个还是刚起步。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岩田和太田他们已经做过很多尝试，有很多好的成绩，对中国的学者来说，还是刚开始。所以对曹先生这一很大的项目来说，下一步工作应该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也是扩大我们这个方言地图集它本身的意义。

2. 广播媒介对方言的影响

石汝傑：

我想提一下赵日新先生他的报告。因为在中国最近特别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怎么保护方言，怎么让方言作为语言的宝库能保存下来。在城市里已经发生很多方言接近消灭的濒危事件。但在农村呢，像赵先生报告的这种情况，我想，知道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希望赵先生这样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我就提一个问题。在刚才赵先生的报告里头没提到现代的传播手段对农村的语言有什么影响，比方说电视、广播、电影那一类的东西，他没提到。

趙日新：

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有一些话没来得及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农村方言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视、广播这些媒体的普及对中国农村地区方言的存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中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即使在农村地区，在小学阶段，已经也开始出现用普通话教学，学生说普通话的现象。当然，县城里面，一般县城这种现象比较普及，农村里这种现象也不太出现，并不是很常见。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的水平越来越高，所以普通话普及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农村方言保存的现状不容乐观。

大西拓一郎：

在中国，广播、电视的普及率大概是多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曹志耘：

百分之百。

大西拓一郎：

日本普通话普及起最大作用的还是电视。在日本，在教学方面有很努力在推广普通话，但是总归还是没有广播媒介那么大的力量。100%的含义是什么呢？大家都能听懂吗？

石汝傑：

我的想法是，不可能是100%，有的地区确实还没有，因为还有电波传不到的地区。

曹志耘：

中国有一个“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这个工程这几年实施的速度非常快。100%可能不敢完全说，但是基本上达到99%。“村村通”工程实施了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了，确实是效果非常好。

大西拓一郎：

与电视机的普及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人们接触该广播媒介的时间。日本的情况是电视普及以后，有不少人总是几个小时都开着电视，所以总是听普通话，这种习惯对普通话的普及很有作用，在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十几个小时家里都有普通话的声音。

石汝傑：

在中国早就有线广播。有线广播是不要钱的，而且是不用开关的，整天放着，主要也是普通话。后来有了电视，很多人也是回家以后就开着电视机，我想是相同的情况，但可能电费用得很多，不一定会开十个小时以上，但是一般晚上的工作就是看电视。

赵日新：

我想就是，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听懂，还有一个，能不能说，想不想说，这应该是不同的问题。现在能听懂普通话的人比例应该很高，有意识地说，或者是说得好，这个可能和听懂应该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也是方言地区过来的。小时候我们就能听到有线广播，普通话都能听懂。但是不会说，即使偶尔会说一两句也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呢？关键是不敢说，说着怕被人笑话。是这样的一个意识问题。

秋谷裕幸(爱媛大学)：

在中国农村，农民比较喜欢看电视，而且喜欢的程度也许比日本人还要高。我最近几年去中国调查的时候，住在当地的旅馆里。旅馆的老板因为看电视看到很晚，早上7点半我临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往往还没有起来，有这种情况。

3. 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

中井幸比古(神戸市外国语大学)：

向曹先生请教。你们编写的地图中音韵条目很多，我对此感兴趣。在日本的方言地图中，除了明治时代的《音韵分布图》这本地图集以外，没有多少地图集收入音韵条目。一个原因是日本调查语音，尤其是调查音高重音(accent)的人并不多，并且要解剖某一方言音高重音

的全貌，也需要庞大的调查时间。请问，在中国方言调查人首先必须了解、掌握、记录语音及声调吗？

曹志耘：

谢谢中井先生提问题。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吧。其实《汉语方言地图集》不仅是和日本言语地图不同，和欧洲的语言地图也不同。欧洲的语言地图也很少有音韵条目，主要都是以词汇条目为主。在这点上，日本的语言地图和欧洲各国的语言地图是一样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汉语自身的特点以及它的研究传统的特点。汉语是由汉字来记录的，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读音，这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另外，汉语研究的传统，有中古的音系，研究音韵的同仁都知道有《切韵》的音系。我们现在都用中古的音系来研究汉语的方言。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研究中古音到现代音之间的语音演变规律。这样我们可以设计很多语音方面的条目。

主持人：

中井先生说，日本的方言学没有多少人调查过词重音，相当于声调，目前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没有办法画词重音的地图。

曹志耘：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这可能跟刚才中井先生提到的调查人的情况有关系。《日本言语地图》，据我所知，很多人并不是语言学家。我们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所有调查者都是受过严格的方言学训练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专家，比如说，石汝杰啊，他们都是调查者，所以在语音方面，在记录和研究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方言的变质

中井幸比古：

向赵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日本推广普通话的程度应该说比中国要高，但是反过来说，方言衰退的程度也会比中国更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完全消灭了，在方言消灭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中间形式，比如说金沢方言中，shirananda 是原来的方言形式，但是最近出现的shirankatta，这是新的形式，虽然接近标准语的形式shiranakatta，但是不完全一致，受到方言固有形式的影响。中国的方言有没有这种中间形式？

赵日新：

有，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方言的许多重要特征都在磨损，都在向普通话靠拢。比如说新派与老派的区别，尤其在词汇上，新派有很多词汇都是新的，普通话跟方言的混合形式也有。

邢向东(陕西师范大学)：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西安方言里面，西安把普通话的老师lǎoshī说成làoosi，西安的新派中有些人把lǎoshī说成làooshi，这里的声调和方言是一样的，但是声韵母却是和普通话一样，这就是一种融合的现象。

中井幸比古：

在日本，标准语的影响首先涉及到词形的变化，韵母、声母发生变化，最晚变化的是声调或者词重音。譬如，我正在说的话是日本关西方言的讹音，而不是标准话。词重音仍是关西话，但其它语音成份大致能看做标准话。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

邢向东：

我觉得在陕西话里，比如说关中话，声调是最后变化的，这一点在关中地区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母语是陕北方言，也是这样的，我有些同学，包括一些打工的人在外地，长期在外，回到老家以后，发音中的声母和韵母有些总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但是声调是不会变的。词变得很快。

太田斋(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我来补充一个方言的例子。比如说西南、西北地区的方言缺少小称的儿化形式。比如说杯子的杯，在云南方言中应该是“杯杯”，直到现在郊区仍然是“杯杯”，但是在城市里，小称形式被加上了儿化，变成“杯杯儿”。这些地区的方言中本来没有翘舌音，只有在小称形式中发现翘舌音出现在词中，那么“杯杯儿”应该是靠近普通话的一种变化，我是这么认为的。

5. 方言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GIS 的运用

中井幸比古：

大西先生的报告，每家每户的平均人口与父亲称谓的相互关系十分引人注目。那里引用的每户人口数字根据 1985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我认为，关系到方言的可能是过去的人口数据，但目前能利用的总不免只有当代的新的数据化资料。

大西拓一郎：

选择 1985 年的人口资料，是因为须与方言调查的时间一致。其实当时的人口普查资料没有电子化了的，所以录入信息工作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承担。目前我们只能得到最新的信息，过去资料的数据化是相当困难的。

曹志耘：

我想请教大西先生一个问题，从大西先生的介绍来看，日本语言地理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解释性的，这是受西方地理语言学影响的，第二个是资料性的，第三个是电子化的，现在处于电子化阶段。我想问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从《日本言语地图》到《方言文法全国地图》，会发生从解释性到资料性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使用 GIS 系统，所谓地理信息系统来研究方言的地理分布，是否能够将非语言的因素包括在内？因为除了地理、地形、交通这些因素以外，影响语言变化的非语言因素还有很多，历史的，社会的，民俗的，文化的等等因素，是否也可以包括在 GIS 系统里面呢？

大西拓一郎：

从解释性的地图至资料性的地图转变，是由于《日本言语地图》的编纂工作当中，不能复原的情况时有发生。我想，在这本《汉语方言地图集》中也有类似情况，即几种形式都被合为一类，但一旦合类，如失去了原始信息，就无法复原。请注意，我并不否定您们的做法。

在《日本言语地图》的时代根本不存在电子化这一概念，故现在要复原原始信息是十分困难的。出于对此情况的反思，在《方言文法全国地图》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避免了任意的处理，而做了一些基本的规定，在此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类工作。如果有一张地图由某个知名的先生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解释来做，那么后来的人就不敢改动，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方言文法全国地图》采用了尽量客观的措施。

现在要回答曹先生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刚才新田先生指出，新词或新的形式往往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从《方言文法全国地图》也可以看出有不少新的形式曾发生过。鉴于这种情形，我将新形式的发生地区及其扩散模式这一信息与人口的分布这一信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番测量。如果把日本的方言分成两块的话，西部地区有倾向在都市部的周围产生了新的词形，而城市本身相对来说比较保守，这是日本西部的情况。日本东部的情况与此则不同。首先，大城市相对来说为数比较少。其次，并不是由于城市化，而是社会上积极活动的人口（年龄层次为15岁至60岁）比率为高的地区在产生新的形式。

曹志耘：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因素都可以包含在GIS里吗？大西先生是否认为GIS是语言地理学走向新生的一条途径？

大西拓一郎：

GIS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能利用所有能够数据化的资料，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不善于处理范畴性的资料，如语言地图，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现在考虑能利用的信息是什么。譬如，男女的人口比例，这种资料也可以利用。

6. 方言的历史

中井幸比古：

新田先生指出，日语形容词“aoi”、“akai”等都有含长母音的形式：a:oi、a:kai，但名词（义为青色、红色）只有含短母音的形式：ao、aka。如敷衍这一事实，也可以推测，古代也存在名词的长短对立，而后来这种母音的长短对立只在形容词中保存下来，我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有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现象？

新田哲夫：

对，形容词的长母音只在形容词中出现，而名词或从名词派生出来的复合词中则不存在长短对立，如naga'iki（长寿）。为什么？目前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很可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或者是古朝鲜语的遗留，因为现代朝鲜语有不少词语含长短母音的对立，当然古代朝鲜语的情况可能与现代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谨慎。

胡士雲（四天王国际佛教大学）：

我对日语的情况不是太了解，从刚才看见的大西先生介绍的地图上，日本的方言，东西似乎分的很明显，我想请教两位先生，这种能够明显分区的现象，它的形成有没有什么历史的或者地理的原因呢？

大西拓一郎：

一定会有历史及地理上的背景。方言的交界连在山区也较明显。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方言边界线的西侧也分散地出现东部的形式，假如它出现在城市，那么可以认做是词形向普通话靠拢的见证，但分布点均为岐阜县人口密度颇低的山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参阅过去出版的非专家（民间方言的爱好者）的记录，得知这些地区原来就具有东部的形式，据此也可以推测，方言的边界线从西边逐渐向东边移动。这种推测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我是这样解释的。